

# 宋代武成王庙与朝政关系初探

陈 峰 胡文宁

内容提要：在沿袭唐代的基础上，宋朝继续设置武成王庙，并确定了相应的礼仪规则。但与以往相比，宋代武成王庙的礼仪内容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，特别是其中陪祀、从祀武将的标准与人选发生多次变动。而这种变化，恰与当时朝政以及意识形态的演变存在密切的联系，由此也从一个侧面展示出其时代价值观的演进轨迹。

关键词：宋代 武成王庙 太公 陪祀 从祀 武将

作为国家确立的武成王庙，初称太公庙，是祭祀供奉兵家鼻祖吕尚的祠庙，始设于唐朝中叶，在形式上与文宣王庙相对应，到唐肃宗时正式定名为武成王庙。<sup>①</sup>其创设的动机，乃在于将吕尚与孔子并列，以体现王朝政府对文武并重的用意，即所谓“帝王大业，文武所以垂范……宣尼大圣，立文以化成；尚父惟师，仗武而弘训”<sup>②</sup>。有关唐朝创立武成王庙的过程，已有学者专门加以研究。<sup>③</sup>另外，在有关贡举及礼制的论述中也有对武成王庙涉及的方面。<sup>④</sup>但宋代武成王庙的地位究竟如何，尤其是其演变与当时的朝政存在怎样的关系，目前学界尚未有专门的研究。本文即专就此问题加以探究。

唐朝贞观年间，以吕尚为兵家之祖的缘故，在关内凤翔府境内的磻溪立太公祠，但这仅属于纪念前代名贤的一般举动。作为古代王朝对吕尚的国家祭祀行为，大致始于唐玄宗朝。开元十九年（731），唐中央下令在两京及诸州各置太公庙一所，以汉代留侯张良配享，在每年春秋两季分别取仲月上戊日，举行祭奠礼。照此规定，太公

① [唐]杜佑著，王文锦等点校 《通典》卷五三《礼一三·太公庙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88年，第1483—1484页。

② [宋]王钦若 《册府元龟》卷三三《帝王部·崇祭祀第二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60年影印本，第359—360页。

③ 于赓哲 《由武成王庙制变迁看唐代文武分途》，《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》第19辑，武汉，武汉大学编辑部，2002年。

④ 高明士 《隋唐贡举制度》，台北，文津出版社，1999年；王美华 《唐宋礼制研究》（博士学位论文，东北师范大学，2004年）。

庙被纳入与文宣王庙待遇相同的吉礼祭祀之中。<sup>①</sup> 天宝六年(747),又诏令:各州武举人来礼部之前,须先拜谒太公庙;凡出师命将以及征战报捷,都要告祭于太公庙。<sup>②</sup>

上元元年(760),唐廷下诏尊太公为武成王,仿照文宣王的从祀规则,选择历代良将十位,作为十哲陪侍于武成王左右两侧。当时列于左侧的有秦武安君白起、汉淮阴侯韩信、蜀丞相诸葛亮、唐卫国公李靖及英国公李勣;右侧依次为汉太子少傅张良、齐大司马田穰苴、吴将军孙武、魏河西太守吴起及燕昌国君乐毅,并给予张良配享的特殊待遇。<sup>③</sup> 按照当时确立的原则,武成王庙的祭祀制度完全按照文宣王庙的规格执行。<sup>④</sup>

从太公庙到武成王庙的确立,标志着唐朝国家对武臣宗师地位的承认。之所以如此,确如研究者所指出:唐朝以武力开国,军功曾长期受到各阶层的重视。但随着承平日久,加之科举选官制度日渐受到推崇,社会风气遂逐渐转向重文。开元年间,为提倡和维持武德精神,唐朝政府将太公吕尚确定为国家礼制大典的祭祀对象,借此抬高武人的社会地位,以维持朝野的尚武风气。<sup>⑤</sup>

不过,武成王庙在唐朝诞生后,也引发许多争议。归纳起来,异议主要在于吕尚既没有孔子丰硕的著述,作为殷商叛臣也缺乏圣人的必备品德,至于其武功业绩似乎也不足以威震古今,因而吕尚在世人心缺乏武圣人应有的威望。尤为重要,孔子有弟子三千,其中更有七十二贤人,并世有传承,从中选择配享与从祀合乎情理,令人信服。而太公望的配享、从祀人选缺乏依据标准。这些批评意见,固然多少隐含着某些文人对推崇尚武的不满,但主要还限于礼法内容是否合理这一范围之内。然而,武成王庙先天不足的缺陷,却为其在宋代的跌宕命运埋下了伏笔。

虽说是宋承唐制,宋朝建立后沿袭了国家祭祀武成王庙的传统,但随着朝政以及内外形势的发展演变,在武成王庙礼制的诸多方面也不断发生变化,从而呈现出独特的时代特点。

① [唐]萧嵩《大唐开元礼》卷一《序例上》,影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,上海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年,第646册,第39页。

② [宋]王溥《唐会要》卷二三《武成王庙》,上海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6年,第507页;[后晋]刘昫《旧唐书》卷二四《礼仪志四》,北京,中华书局,1975年,第935页;[宋]欧阳修《新唐书》卷一五《礼乐志五》,北京,中华书局,1975年,第377页。

③ 《新唐书》卷一五《礼乐志五》,第377页。

④ 《唐会要》卷二三《武成王庙》,第508页。

⑤ 参见于赓哲《由武成王庙制变迁看唐代文武分途》一文。

北宋前期,祭奠武成王的礼仪由太常礼院掌管,太常寺仅负责武成王庙习乐事项。宋神宗元丰改制以后,太常礼院撤销,遂由太常寺继续统管包括武成王在内的各项礼乐之事。<sup>①</sup>如果说这种管理机构上的变动,也适用于文宣王庙等礼制对象,那么有关武成王庙自身的诸多变化,则远非他者可以比拟。

从宋代武成王庙的设置情况来看,已与唐代存在较大的差别。建隆三年(962),宋太祖下诏在东京开封修武成王庙,以与国子学相对应,其地址位于开封城内的龙津桥南街西之武学巷。<sup>②</sup>左谏议大夫崔頌和宦官卢德岳奉命监修,并受命会商上报唐末以来的谋臣猛将。<sup>③</sup>景德四年(1007),宋真宗又下诏在西京修建武成王庙,规格与东京相同,同时在西京也设立国子监。<sup>④</sup>次年,还在青州设武成王庙。<sup>⑤</sup>至南宋时期,仅在行在临安府修建了武成王殿,地点位于太学之侧的前洋街。<sup>⑥</sup>由此可见,宋代仅在京师及个别地方保留武成王庙,与唐代各州皆设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,反映了其影响范围大为缩小的事实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,祭祀孔子的文宣王庙则遍设各地,并且不断修缮扩建。如宋儒周敦颐在邵州任内便进行了文庙的迁址扩建,他还专就此撰文指出:

惟夫子道高德厚,教化无穷,实与天地参而四时同。上自国都,下及州县,通立庙貌……得其位,施其道,泽及生民者,代有之。然夫子之宫可忽欤?<sup>⑦</sup>

就宋代武成王庙礼制的主要程序而言,大致延续了唐制。宋代武成王庙的祭祀日期,仍选在春秋两季的仲月上戊日举行,其过程和礼数也与唐代类似。<sup>⑧</sup>具体有“时日”、“斋戒”、“陈设”、“省馔”和“行事”<sup>⑨</sup>,其中繁琐细节,在此不予细述。

依照宋代最初的规定,祭祀文宣王、武成王同用《永安》之乐<sup>⑩</sup>,牲牢用羊一、豕一。嘉祐七年(1062),在翰林学士王珪的建议下,武成王与文宣王一并增加为羊

① [清]徐松辑《宋会要辑稿》职官二二之一七,北京,中华书局,1957年,第2868页。

② [宋]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卷二《朱雀门外街》,李士彪注,济南,山东友谊出版社,2001年,第16—18页。

③ [宋]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(以下简称《长编》)卷三,建隆三年九月壬申,北京,中华书局,1992年,第72页;[元]脱脱《宋史》卷一〇五《礼志八》,北京,中华书局,1985年,第2556页。

④ 《宋史》卷七《真宗纪二》,第132页。

⑤ 《宋史》卷七《真宗纪二》,第138—139页。

⑥ [宋]吴自牧著,傅林祥注《梦粱录》卷一五《学校》,济南,山东友谊出版社,2001年,第201页。

⑦ [宋]周敦颐《周敦颐集》卷三《邵州迁学释菜文》,陈克明点校,北京,中华书局,2009年,第55页。

⑧ 《大唐开元礼》卷五五《吉礼·仲春仲秋释奠齐太公》,第646册,第389—392页;《宋史》卷一〇五《礼志八》,第2555页。

⑨ [宋]郑居中《政和五礼新仪》卷一二二《吉礼·释奠武成王庙仪》,影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,第647册,第617—620页。

⑩ 《宋史》卷一二六《乐志一》,第2940页。

三、豕三<sup>①</sup>。高宗绍兴时，则都改为两少牢<sup>②</sup>。从礼仪形式看，倒是文武并无明显差别。但在其他方面，则逐渐呈现出崇文抑武的倾向。

在宋代，祭祀武成王的献礼官前后存在变化。北宋初期，由兵部掌春秋释奠武成王庙<sup>③</sup>，直到元丰二年（1079），仍令武职性的三班院选差使臣作为分献官<sup>④</sup>。元丰改制后，武学始隶于国子监，初献官改为文职性的国子监祭酒和司业，但亚献、终献依旧令三班院差使臣充当。不久，在国子司业朱服的建言下，三献官完全由国子监官员充摄行事。<sup>⑤</sup>具体为：祭酒、司业为初献，祭酒及司业丞为亚献，丞博士为终献。<sup>⑥</sup>这就疏远了武成王庙与武职军事系统的关系。虽然《政和五礼新仪》如同《开元礼》一样，也有命将出征的告武成王庙仪，<sup>⑦</sup>但在宋代各种史料记载中少有践行的实例，显然是徒具虚文。<sup>⑧</sup>这一则说明了礼制与实践上的差异，更显示出宋代武成王庙在军事上的意义已经有所淡化。事实上，宋朝的讲武礼也存在类似的情况。<sup>⑨</sup>

在宋朝礼制的一些细节上，武成王庙也拉开了与文宣王庙的距离。按照宋朝规矩，皇宫殿门左右各设十二“门戟”，以“应天数”；宗庙门以及国学、文宣王庙门也是左右各有十二门戟，而武成王庙左右只设八个门戟<sup>⑩</sup>，规格明显下降。大中祥符初，宋真宗封禅泰山后，亲临曲阜祭祀孔子，并加孔子谥号为玄圣文宣王，旋改谥至圣文宣王。为与孔子的谥号相对称，也同时追谥太公曰昭烈武成王<sup>⑪</sup>。表面上武成王的谥号也水涨船高，但实际上打破了“文宣”与“武成”这一文武对等的格局，“至圣”将孔子提高到“昭烈”无法企及的高度。另外，唐朝武成王庙中还仿照有文宣王庙中的“十哲”名号，但在宋代却不再加以沿用。排序最高的前十位将领只是列于堂中的东西两向，以别于东庑和西庑中所列之将，从而在名誉上降低了陪祀者的规格。

值得关注的是，宋代的武成王庙还常常派作其他场所。如最初曾被作为科举考试

① 《宋会要辑稿》礼二六之一〇，第1008页。

② [宋]李心传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卷一一一，绍兴七年五月壬申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56年，第1793页。

③ 《宋史》卷一六三《职官志三·兵部》，第3854—3855页。

④ 《长编》卷二九九，元丰二年八月丁酉，第7277页。

⑤ 《宋史》卷一〇五《礼志八》，第2556页。

⑥ 《政和五礼新仪》卷五《序例·献官》，第647册，第149页。

⑦ 《大唐开元礼》卷八八《军礼·制遣大将出征有司告于齐太公庙》，第646册，第526—567页。《政和五礼新仪》卷一五九《军礼·命将出征仪下·告武成王庙》，第647册，第705—706页。

⑧ 关于遣将的仪式，《明史》中说道：“汉高命韩信为将，设坛具礼。北齐亲授斧钺。唐则告于庙社，又告太公庙。宋则授旌节于朝堂，次告庙社，又祠祭黄帝。”可见唐宋在这一点上的确不同。有关记载见[清]张廷玉《明史》卷五七《礼志十一·遣将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74年，第1432—1433页。

⑨ 参见拙作《北宋讲武礼初探》，《清华大学学报》2007年第5期。

⑩ 《宋史》卷一五〇《舆服志二》，第3514页。

⑪ 《宋史》卷七《真宗纪二》，第138—139页。

的考场，少有人考虑到是否影响其肃穆庄重，反倒有人觉得有辱于科举本身。宋太宗朝的右拾遗田锡曾不满道“礼部无贡院，每贡士试，或就试武成王庙。是岂太平之制度耶？”<sup>①</sup>言语中流露出对武成王庙的轻视。

到宋仁宗朝，国子监不愿让医官在国子监内授课，认为“儒者讲学之地，不宜令医官对列”。遂将之推给太常寺，而太常寺因无场地，最后只能令医官带学生去武成王庙授业。<sup>②</sup>当时，参知政事范仲淹也主动建言：选派翰林院的数名医师，在武成王庙开办医科学学校，在京城招生，学制三年，合格者可择优录用。<sup>③</sup>在供奉武圣的祠庙中教习诊脉、针灸、药剂之类的事，实与场所性质不符。

熙宁年间，太学实行三舍法，将生员分为外舍、内舍和上舍三等。在确定教学场所时，锡庆院被定为上舍，国子监被定为内舍，而武成王庙则为地位最低的外舍。<sup>④</sup>不难想象，在太学生眼中武成王庙又成了低人一等的象征。

通观宋代有关典籍史料不难发现，两宋历朝皇帝鲜有专程拜谒武成王庙者，通常的情况是先赴国子监，拜谒文宣王后再去武成王庙。<sup>⑤</sup>在文宣王庙中，帝王往往是一拜再拜，而在武成王庙，只是“肃揖”而不拜，对比相当强烈。<sup>⑥</sup>难怪皇帝每次拜文宣王时，虽然有司所定仪礼为肃揖<sup>⑦</sup>，却总是打破常规施礼。所谓“虽天子之尊，入庙肃恭行礼”<sup>⑧</sup>。但在武成王庙，则仅依照规定完成礼制的基本要求。宋代帝王与官员在礼制上对武成王庙的轻视，自然会降低武庙在社会上的地位。

## 二

在宋代武成王庙礼制的各种变化中，最引人注目的内容是出现了陪祀、从祀武将忽升忽降、忽进忽退的现象。细究如此变化的过程，更能清晰地发现其与朝政演变之间的直接关系。

建隆二年（961），宋太祖在亲临武成王庙时，看到白起像名列壁画名将之中，便不满地说“起杀已降，不武之甚。”当时的武成王庙，为后周所遗留，因此从祀武将的选择仍反映的是唐朝以来的观念。两年后，宋太祖到新落成的武成王庙，又看

① 《长编》卷二二，太平兴国六年九月壬寅，第497页。

② 《长编》卷一四七，庆历四年三月丁亥，第3570页。

③ 《长编》卷一四七，庆历四年三月丁亥，第3569—3570页。

④ [宋]司马光著，邓广铭、张希清点校《涑水记闻》附录二《温公日记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89年，第379页。

⑤ 《长编》卷四，乾德元年四月丁亥，第88页；《长编》卷一〇二，天圣二年八月己卯，第2366页。

⑥ 《宋史》卷一一四《礼志一七》，第2708—2711页。

⑦ 《宋史》卷一〇五《礼志八》，第2548页。

⑧ 《周敦颐集》卷三《邵州迁学释菜文》，第55页。

到白起的画像，遂怒道“此人杀已降，不武之甚，何受享于此？”当即下令剔除。<sup>①</sup>于是，知制诰高锡上疏认为王僧辩有始无终，也不应该纳入从祀之列。赵匡胤于是下诏，命吏部尚书张昭 and 工部尚书窦仪重新审核从祀诸将，并要求以功业前后无瑕疵者为标准。

乾德元年（963）六月，张昭等在原有基础上重新定出名单，共增选23人，减退22人。增选的诸将为：灌婴、耿纯、王霸、祭遵、班超、王浑、周访、沈庆之、李崇、傅永、段韶、李弼、秦叔宝、张公谨、唐休璟、浑瑊、裴度、李光颜、李愬、郑畋、葛从周、周德威、符存审。而减退的则为：吴起、孙臆、廉颇、韩信、彭越、周亚夫、段纪明、邓艾、陶侃、关羽、张飞、杜元凯、慕容绍宗、王僧辩、吴明彻、杨素、贺若弼、史万岁、李光弼、王孝杰、张齐丘、郭元振。宋太祖下诏特将管仲塑像于堂，而将吴起画像置于庑下，其余按张昭所议的名单实施。<sup>②</sup>乾德三年，官方还编修了《武成王庙配享事迹》三十卷，对吕尚及张良以下共73人事迹加以叙述。<sup>③</sup>

从以上陪祀、从祀武将的增删名单可以看出，宋太祖对滥杀尤其是杀降的行为不能容忍，反映了对武将武德标准的重新审视，这无疑是对唐末五代时期悍将跋扈、滥杀无辜，从而加剧社会动乱并危害皇权国家后果教训的警惕。事实上，在立国与统一的实践过程中，宋太祖也贯彻了这一精神。如王全斌统军灭亡后蜀之际，出征将校沿袭旧习烧杀抢掠，导致川蜀局面动荡不已，赵匡胤便对主帅王全斌及其以下诸多将帅予以贬责。大将曹彬、潘美受命率大军征伐南唐时，他特别预先告诫二人：“城陷之日，慎无杀戮。设若困斗，则李煜一门，不可加害。”<sup>④</sup>而对功臣大将兵权的收夺，也采用了和平的方式解决，即所谓“杯酒释兵权”。宋太祖对武将武德标准的态度，顺应了宋初政权建设与社会稳定的要求，故在相当的时期内也为后世嗣君所延续。

但到了庆历年间，宋廷又对太祖时确定的武成王庙陪祀、从祀的武将进行了较大更改，“自张良、管仲而下依旧配享，不用建隆升降之次”<sup>⑤</sup>。揆诸此事，应与当时紧张的边防军事形势有关。庆历元年（1041），宋军在与西夏交战中败于好水川。翌年，在辽朝陈兵威胁下，北宋又被迫向对方增加岁币。为了加强武备、振兴军威，以鼓励将士奋勇作战，于是恢复了旧制，将前代战功显赫而“道德”不达标的22位武将，再度重归武庙中的地位。与此同时，还一度创设武学于武成王庙。宋神宗登基后，致力于恢复汉唐旧疆，又重建武学于武成王庙。

到宋徽宗宣和五年（1123），宋廷将武成王庙从祀历代诸将中未有封爵者，全部

① 《宋会要辑稿》礼一六之五，第685页 《宋史》卷一〇五《礼志八》，第2556页。

② 《长编》卷四，乾德元年六月癸巳，第92—93页。

③ [宋]郑樵《通志》卷六五《艺文略三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87年，第779页。

④ 《宋史》卷三《太祖纪三》，第42页。

⑤ 《宋史》卷一〇五《礼志八》，第2556页。

封以侯、伯的爵位。至此，武成王庙中除吕尚外，从祀共 72 将，在庙中的排列为：以张良配享殿上；管仲、孙武、乐毅、诸葛亮、李勣并列堂中西向；田穰苴、范蠡、韩信、李靖、郭子仪并列堂中东向。在东庑中，依次有白起、孙臬、廉颇、李牧、曹参、周勃、李广、霍去病、邓禹、冯异、吴汉、马援、皇甫嵩、邓艾、张飞、吕蒙、陆抗、杜预、陶侃、慕容恪、宇文宪、韦孝宽、杨素、贺若弼、李孝恭、苏定方、王孝杰、王峻、李光弼，并西向；西庑内，依次为吴起、田单、赵奢、王翦、彭越、周亚夫、卫青、赵充国、寇恂、贾复、耿弇、段颎、张辽、关羽、周瑜、陆逊、羊祜、王濬、谢玄、王猛、王镇恶、斛律光、王僧辩、于谨、吴明彻、韩擒虎、史万岁、尉迟敬德、裴行俭、张仁亶、郭元振、李晟，并东向。<sup>①</sup>

若将以上名单与《唐会要》记载的唐代武成王庙陪祀、从祀武将对比的话<sup>②</sup>，可以看到如下变动：

宋代设在大堂西向和东向的十将，相当于唐时的十哲，但区别在于：将唐时确定的张良从十哲中单独升入正殿之上，以突出其配享地位；将十哲中的白起和吴起降次到东庑和西庑，同时将管仲、范蠡、郭子仪升位，所以西向和东向仍保持十将。

东庑和西庑所列名将与唐朝大致相同，变化除了有降格下来的白起和吴起外，还有两个区别：一则新增了李晟一人，另一则剔除了檀道济、长孙嵩和慕容绍宗三人。这样，宋代包括张良在内的所有陪祀、从祀武将，恰好 72 人，与文庙中的 72 贤匹配。而唐代虽称是 72 名将，但实际数额并不准确。

宣和五年的这次举动，其实也与当时的对外形势有关。宣和二年，宋与金结成“海上之盟”，以联合伐辽。宣和四年，金军攻陷辽燕京（不久宋改为燕山府）。次年，金以燕京及涿、易、檀、顺、景、蓟州归宋，童贯、蔡攸率军进入燕山府。至此，宋朝基本收复了燕云地区。虽然这并非宋军的武力所致，但毕竟实现了宋朝开国以来未能完成的北伐目标。为满足宋徽宗好大喜功之心，当政者不免也要庆贺一番。既然有“赫赫武功”，自然应惠及武庙。于是礼部就将武成王庙从祀诸将中未有封爵者，全部予以加封，以示对武功的尊崇。

但令人注意的是，礼部同时又用儒家道德标准对陪祀、从祀武将进行了一次品评，具体表现为调整了他们的座次。将张良升入正殿之上，又将管仲、范蠡、郭子仪从两庑升到正殿之内，却将白起和吴起降次到东西两庑。显然，前四位不但有忠义的形象，而且鲜有居功跋扈之举，自然受到青睐；而后者中的白起屠杀降卒不必再说，至于吴起，正如曹操所评价：“吴起贪将，杀妻自信，散金求官，母死不归。然在魏，秦人不敢东向；在楚，则三晋不敢南谋。”<sup>③</sup> 汉末乱世，曹操求才若渴，即便

① 《宋史》卷一〇五《礼志八》，第 2556—2557 页。

② 《唐会要》卷二三《武成王庙》，第 508 页。

③ [晋]陈寿《三国志》卷一《魏书·武帝纪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59 年，第 49 页。

“缺德”如吴起，照样唯才是举。但在宋代推崇儒家道德的风气下，即便在重视武功的特殊时期，也不会忽视对武将进行道德的考量。通过降低白起和吴起在武庙中的地位，也是对当世武将的一种警示。

南宋初期，战事异常紧张，原东西两京又已沦陷，宋廷自然无暇顾及武成王庙的问题。随着南宋武力的加强，政权逐渐巩固，宋高宗意识到有为将帅在保卫江山社稷中的重要作用，如其所云：“兵无可不用，在主将得人耳。赵奢用赵兵大破秦军；而赵括将之则大败。乐毅用燕兵破齐，而骑劫代之，则为田单所败。岂不在主将得人乎？”<sup>①</sup>于是，在绍兴七年（1137）五月恢复了对武成王的祭祀。

绍兴十一年（1141），“绍兴和议”订立，南宋王朝以屈辱的方式取得了暂时的和平。与此同时，统治集团实施了第二次收兵权，并罗织罪名杀害了岳飞。随着对武将地位的再度打压，宋廷遂重新对武成王庙加以审视，正统的道德标准又一次成为衡量从祀武将的依据。绍兴十六年（1146），在祠部员外郎陈诚的建议下，“诏武成王庙从祀诸将，升赵充国于堂，降韩信于庑下”<sup>②</sup>。绍兴二十九年（1159），右正言都民望又指责李勣好战黩武，“邪说误国，唐几几灭”。于是，李晟被升为陪祀位置，而李勣则被降于堂下李晟原有位序。<sup>③</sup>

乾道六年（1170），力主抗战的宋孝宗为激励士气，拟选择本朝功勋卓著将帅从祀武成王庙。结果礼官们遍考建隆、建炎以来名将，最后确定的唯一人选为曹彬。<sup>④</sup>这位宋初大将虽有剪灭江南之功，但在雍熙三年的北伐中却大败而归，<sup>⑤</sup>故难称名将。而诸如杨业、狄青、郭逵、岳飞、韩世忠以及吴玠等等将领，无论战功还是斗志都居曹彬之上，却未能入选。以此观之，之所以最终选择曹彬，显然不是因为其战功的缘故，而是在于其不仅认真贯彻太祖戒杀的诏命，更在于其谦逊礼让、不居功自傲的理由。曹彬谨慎为将的品行素来受到宋统治者的高度评价，因此入选为武成王庙中的当朝武将代表。但褒扬这样一位近乎平庸的武将，自然体现的是推崇儒家正统品德的价值取向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与宋朝对立的金朝也受到汉文化的熏染。泰和六年（1206），金章宗下诏于都城内修建武成王庙，不过，其礼制却“一遵唐制”。次年，在官员的请求下，将金朝开国名将宗翰与张良同处陪祀位置，将管仲降格为从祀之列。随后又将宗望、宗弼等纳入从祀行列，而将王猛、慕容恪等废黜，以继续保持72陪祀、从祀

① 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卷一一一，绍兴七年五月乙丑，第1791页。

② 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卷一五五，绍兴十六年九月丙申，第2516页。

③ 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卷一八一，绍兴二十九年四月辛丑，第3012页。《宋史》卷一〇五《礼志八》，第2557页。

④ 《宋史》卷一〇五《礼志八》，第2557—2558页。

⑤ 《宋史》卷二五八《曹彬传》，第8981—8982页。



武将之数额。<sup>①</sup>

### 三

宋代武成王庙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，尤其是出现的陪祀、从祀武将反复变动的现象，既与当时王朝政治的演变存在直接的关系，也是其主流价值取向发展下的必然产物。

宋朝上承唐末、五季兵戈战乱之后建国，故统治者急于结束动乱、重建社会秩序，与此同时也力图扭转重武轻文的社会风尚。随着军功集团的快速消亡和文官士大夫当政局面的形成，<sup>②</sup>因礼制惯性延续而设置的武成王庙，逐渐被赋予传统的儒家道德观，统治集团以正统的伦理标准为其定位，将武功纳入文德的范畴之内。因此，武成王庙不仅只限于个别地方的礼数明显低于文宣王庙，其场所还不时被派作其他用途，而且对其中的从祀武将随意褒贬。如此一来，武成王庙扮演的角色及自身存在的价值便受到削弱，其地位的下滑自然在所难免，可以说武庙不但成了文庙的陪衬，而且充当了宋朝推行“崇文抑武”国策的辅助工具。

针对唐开元时设立太公庙的问题，司马光在编修《资治通鉴》时有如下评论：

经纬天地之谓文，戡定祸乱之谓武，自古不兼斯二者而称圣人，未之有也。故黄帝、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伊尹、周公，莫不有征伐之功。孔子虽不试，犹能兵莱夷，却费人，曰“我战则克”，岂孔子专文而太公专武乎？孔子所以祀于学者，礼有先圣先师故也。自生民以来，未有如孔子者，岂太公得与之抗衡哉……自孙、吴以降，皆以勇力相胜，狙诈相高，岂足以数于圣贤之门而谓之武哉！乃复诬引以偶十哲之目，为后世学者之师；使太公有神，必羞与之同食矣！<sup>③</sup>

司马光在此表达了四层意思：其一，圣人应是文武兼备，不应以文圣和武圣分属孔子和太公；其二，孔子是至圣先师，无人可比拟，太公也不例外；其三，立太公庙，有崇尚武力之嫌，易导致世人好武勇而不知礼义；其四，从祀于太公庙的孙武、吴起以下兵家名将，都是以勇力和诈谋相胜之徒，不配入圣贤之门，不可为后世之师。由此可见，作为当时政治家和士大夫代表人物的司马光的这种态度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宋代当政集团的普遍认识与主流价值取向，反过来自然也影响着对武成王庙规则的定位与修改。

<sup>①</sup> 《金史》卷三五《礼志八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75年，第818页。

<sup>②</sup> 参见拙作《宋代军功集团在政治上的消亡及其影响》，《中国史研究》2008年第4期。

<sup>③</sup> 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一三《唐纪二九》，开元十九年三月丙申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56年，第6795—6796页。

正因为如此,本应使人崇拜敬畏的武圣之庙,成了宋人随意品评的对象,陪祀、从祀诸将忽进忽退、忽升忽降,几同儿戏,这就侵害了其严肃性、权威性。早在宋初时,朝臣梁周翰即向当政者反映:即使圣人如周公、孔子者,也不能尽善尽美、始终如一,所以不能去苛求武庙从祀的武将。他并指出若随意变更,“吹毛求异代之疵,投袂忿古人之恶,必使时情顿惑,窃议交兴”,最终将影响武成王庙“劝激戎臣”的目的。<sup>①</sup>但其建议却未被接受。之后,维护武庙地位的呼声便消失殆尽。

就吕尚本身的形象而言,自唐代已被认为存在诸多缺陷。特别是吕尚作为殷臣,却佐周灭商,以此“不忠”的行为难免受到后世帝王与儒士的诟病。与传说中的战神蚩尤相比,吕尚在威武暴烈上也有些相形见绌。传说中的蚩尤,兽身人面,铜头铁额,其好战彪悍的“战神”形象,也长期受到武人的崇拜,被视为可以激励军兵浴血奋战的神祇代表。因而,吕尚虽被看作兵家鼻祖,其事迹和著述(皆为伪托)只留下诡诈奇计的印象,不仅文人不视之为“圣”,认为无法与文圣孔子相提并论,武人似乎亦不能从中汲取武勇之力。所以宋代将帅出征时,往往不是去告祭武成王庙,而是不忘祭祀蚩尤,希望这位能呼风唤雨的战神保佑军队取得胜利,此即军礼之首的“禘祭”的内容之一。<sup>②</sup>由此,武成王庙在宋代就逐渐成为摆设,并直接导致其地位在后世的沦丧。

如所周知,关羽以其忠义、坦荡的形象在民间得到广泛的崇拜,其忠心不事二主的品格更受到后世统治者的青睐。因此,关羽在宋代以后就渐渐取代了吕尚的地位,明朝时的关羽庙已经成为事实上的武庙,关羽也被树为新一代的武圣。

洪武二十年(1387),明太祖下诏:罢武成王旧庙,去其王号,令吕尚从祀帝王庙。<sup>③</sup>这样在中国古代延续六百多年的武成王庙,随之消亡于国家礼制之中。到清朝时,已有学者讥讽武成王庙“几同淫祠”<sup>④</sup>,可见其沦落到民间祠庙的境地,并遭到士人的轻视。

综上所述,在宋代朝政路线与主流意识观念的影响下,武成王庙从纯粹象征武学与武功的代表,逐渐演化为文德和儒学标志的文宣王庙之附庸,其地位遂不断下降,并影响及后世,由此则折射出宋代不同于以往的时代特征。

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《宋代治国理念及其实践研究》成果之一,批准号:09XJA770003。

(作者陈峰,1960年生,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;胡文宁,1968年生,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)

收稿日期:2011年4月12日

<sup>①</sup> 《宋史》卷四三九《梁周翰传》,第13000—13002页。

<sup>②</sup> 《宋史》卷一二一《礼志二四》,第2829页。

<sup>③</sup> [明]申时行《明会典》卷九一《礼部四十九》,北京,中华书局,1989年,第517页。

<sup>④</sup> [清]秦蕙田《五礼通考》卷一二三,影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,第137册,第974页。